

重读《论持久战》，体悟胜战之道

■ 王世枚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立起了指导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思想灯塔。80年后，重读这篇长达五万字的历史雄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有助于我们走近历史、体悟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思想性、科学性、进步性。

《论持久战》是划破时空的胜利预言。这一思想的最宝贵之处，正在于它超前于战争进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外御强敌的胜战之道。当时，抗战已进行了10个月，战火由北平、上海烧到北起包头、南到杭州的广袤战线，国民党既没有充分地动员民众，指挥上也笨拙呆板，短短时间内损失了近百万军队。随着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国土的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和人心——中国到底会不会亡国？抗战到底要打多久？如何才能取胜？整个中国社会都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正是在这种黑暗迷茫、莫衷一是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抗战前期经验的基础上，严肃批驳了“亡国论”的荒谬、“速胜论”的虚妄，“拼命论”的鲁莽，准确回答了中华民族最为关心的时代之问：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中国抗战是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正面回应了中国全民族抗战能不能打、打多久、怎么打等基本战略问题，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信念。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不仅在延安引发轰动，对整个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震将军回忆：“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伟大胜利。”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掀起学习《论持久战》的热潮，很多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正是通过传阅《论持久战》，了解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方向。一位外国记者当时报道称，“大部分中国人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在海外，《论持久战》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高度评价《论持久战》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就连日本后来也为《论持久战》所折服，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宣称：“我们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必然的，这种以哲学为基础的宏大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是以弱胜强的科学运筹。面对中日两国的悬殊力量对比，毛泽东站在战略哲学的高度，概括了中国抗战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预测了中国战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大阶段进程，提出了以持久包围战、以游击对进攻、以反包围对包围等灵活战法，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

争胜利的路线图。纵观《论持久战》一文，“战争”先后出现了498次，“战略”出现了132次，“阶段”出现了104次，“胜利”出现了89次，“游击”出现了82次，“持久”出现了75次，“游击战”出现了62次，“运动战”出现了58次，处处都体现了求胜意识、主动精神、辩证思维。

持久战的思维和理念，不是简单地保存实力，而是实事求是地应对；不是简单地等待观望，而是有目的、分步骤地推进，既避免了鸡蛋碰石头的无谓损失，又形成了灵活制敌的战争方略。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里逊时，毛泽东把持久战战略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加仑）。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毛泽东反客为主、动态运筹的杰出指挥艺术，跳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战略领域闪闪发光。这是为中国打败日本量身定制的制胜之道，人力有限的日军即使知道了

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那就是瑞典空军上校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多才多艺，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的远亲，在瑞典军界人脉广泛，颇受重用，经手掌握瑞典国防部大量机密，因为胆小怕事同时又极其虚荣，1948年在莫斯科担任瑞典驻苏空军武官时被苏军总参情报部“格鲁乌”招募，1952年赴美担任空军武官，1957年任满回国，在1961年退役之前一直担任瑞典武装力量总司令部作战部空军部门的负责人，退役后担任外交部长军事顾问，前后为“格鲁乌”效劳将近15年，为苏联人提供了瑞典、北约及其成员国大量核心内幕情报资料，1963年被捕后酿成“瑞典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丑闻”。

正是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向“格鲁乌”报告了瑞典军用侦察机的飞行时间和路线，莫斯科才获得了机会击落这架瑞典侦察机。

侦察机的行动是密级极高的保密信息，难为外界所知，况且这架侦察机还以“运输机”的身份作为掩护，那么苏联是如何确切获知这架侦察机的真实身份以及活动情况的呢？这还要归功于他们在瑞典空军

毛泽东的战略原则，也无法拿出复制或反制的战略对策。

即使是立场、政见不同的国民党方面，也对《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赞不绝口。曾任白崇禧秘书的程思远先生回忆，白崇禧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还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傅作义、卫立煌等将领对《论持久战》也很感兴趣，不仅自己读，而且也让部下学习。

《论持久战》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法宝。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军事特别是武器上的优势，毛泽东深刻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鲜明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论断，强调“只要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灭亡就不可避免”。这一思想，开辟了新的战略博弈空间，深远地影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整个抗战时期的发展和壮大，也奠定了人民军队的最终胜利基础。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扎根农村，把人民大众充分动员起来。抗日根据地民兵发展到220多万人，人民自卫军达到10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的十倍多。广大民兵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处处打击敌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战术战法，演绎出“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人民战争壮丽景观。日军尽管装备精良也只能处处挨打、焦头烂额，在占领区“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基本破产。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指出，“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之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原典

“擒贼擒王”在《三十六计》中的原文为：“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意为摧毁敌人主力，抓住其首领，就可以瓦解敌整体力量，好比龙跃出大海到陆地上作战，面临绝境一样。此计的基本意思是指在战争中攻敌要害，求得彻底胜利。计名见杜甫《前出塞》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古代战例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气焰嚣张，连战连捷。其子安庆绪派猛将尹子奇率十万劲旅进攻睢阳。御史中丞张巡坚守睢阳，击退敌军进攻二十余次。夜间，张巡率领守军夜袭尹子奇军营，他的队伍一直冲到敌营帅旗之下，接连斩杀敌将五十余名，敌军大乱。这时张巡一心想要射死尹子奇，但却不认识他。张巡急中生智，叫士兵削尖蒿秆当箭射。敌军以为张巡部队的箭已经射完，只能拿蒿秆充当箭，于是都争先恐后向尹子奇报告。就这样张巡顺藤摸瓜认出了尹子奇，便立刻命令手下射箭对准敌主将尹子奇射出真箭。一箭射去，正中尹子奇左眼，顿时鲜血淋漓，尹子奇仓皇逃命。他手下的官兵看到主将中箭负伤逃走，立刻军心大乱，如潮水般溃散。

现代战例

在现代，战争样式、作战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擒贼擒王可以理解为打击指挥部，可以在正面攻击中，也可以利用敌人错觉，作为“掏心战术”的谋略。1948年7月，我军攻克襄阳就是一例。襄阳地处要冲，其东、西、北三面紧邻汉水天堑，南面紧依丛山屏障。在汉水和城南大山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城西门。城外重重山峦中筑有许多明碉暗堡，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守敌指挥官

康泽是个反共老手，熟知我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的作战特点，攻坚战斗一般都是先扫清外围，而后层层剥皮向中心打。我军某团根据守敌的这一印象并结合当地地形特点，集中兵力，首先劈开琵琶山，夺取距城最近的真武山，打开走廊要道，一个“黑虎掏心”，直逼襄阳城下，使外围山头上的敌军统统失去作用。然后，我攻城部队又以声东击西之法，攻破城池，活捉康泽，解放襄阳。

计谋分析

在此计中，“王”意指国家、军队和各种组织机构的首领或核心，是展开集体行动的指挥调度中心，是组织机构发挥整体力量的枢纽或关键。一旦核心和关键人物不复存在，整个组织机构会立刻瘫痪瓦解。因此，要消灭或瘫痪一个组织，攻击重心便是其首脑和核心人物。

擒“王”的具体实施方法和计谋有很多种，还可以多计并用。硬碰硬杀是一种办法，但往往要付出高代价而且不易成功。正因为“王”很重要，因此“王”受到了严密保护，要想实现擒“王”的目标绝非易事，首先必须能够找到这个“王”才行。

调虎离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王”和部众在一起，如龙在潭，虎在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首先设法引诱“王”离开部众，使“王”和部众无法接触与联系。

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不断创新的作战理论和各种高新技术有效驱除了“战争迷雾”，为擒“王”增添了新途径，例如“定点清除”和“外科手术”打击已经成为擒“王”的常用之法。

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军就已经展开战场情报搜集活动，为擒“王”斩首做准备，通过卫星侦察、特战渗透、拉拢线人和收买情报等多种手段锁定萨达姆所处位置，寻找机会试图“斩首”萨

达姆，伊拉克战争就是在美军获得萨达姆正在某地召开秘密会议的情报后，临机实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为序幕而开始的。而战争开始后，美军不以歼敌夺地为目标，而是直捣黄龙，扑向伊首都巴格达，仅用21天时间就攻占巴格达，以很小的伤亡代价实现了政权更替的目标。

在“后萨达姆时代”的反恐战争中，美军的擒“王”之法也有了新发展。2006年美军猎杀“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头目扎卡维的行动突破了传统的特战“斩首”模式。

作为擒“王”术的特战“斩首”行动不再是特种部队的专利，联合成为特战“斩首”的内在基因，组建由军方、中央情报局等不同职能机构组成的深度融合、灵活敏捷、适应力强的“超级团队”成为成功擒“王”的关键。“超级团队”呈现出无疆界、去中心化等特征，具有作战力量网状分布、作战行动体系支撑、作战指挥重心下移、作战手段多维联动等特点，在此后击毙本·拉登等重大特战“斩首”行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开启了擒贼擒王的新模式。

此外，擒“王”还有其他很多方法，三十六计中的很多计谋都可以用于擒“王”。而且各种方法之中，又有很多可以变通之处。总之，方法常变，但是擒“王”这条原则却是恒定不变的。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十八计：『擒贼擒王』

刘 鹏



引进技术、改进、再出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有实力的国家都重视研制和生产速度快、能够携带大威力鱼雷的鱼雷艇。而在竞速艇方面有不错技术基础的美国却对其不感兴趣。

到了1938年，美国海军开始推动鱼雷艇的发展。但国内造船厂商并没有拿出令美国海军满意的型号。随后，美国造船厂商开始向更有经验的英国购买、引进技术。在引进了英国MTB鱼雷艇的技术后，美国造船厂商在该鱼雷艇设计师的帮助下，进行了重大改进。生产中平均10天下水一艘。但首批10艘鱼雷艇却并未交给美国海军，而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了英国皇家海军，参加了地中海的战斗。这批鱼雷艇技术源自英国，改进生产在美国，服役又回到了“娘家”英国。

“大脑袋”易翻车



苏联二战时期的KV-2重型坦克，有着一门152毫米口径的M-10榴弹炮，这一口径无论对于当时还是现在的坦克都是非常大的。为了容纳巨大的152毫米炮，以及装填手、炮长和弹药，设计团队为其设计了一个“大脑袋”炮塔。

虽然152毫米炮的威力十分可观，可以直接在地面上炸出一个直径5米深2米的大坑，但52吨的车重使得底盘不堪重负，机动性差不说，还经常出故障。巨大的炮塔在车身倾斜时无法转动，不然结局就是翻车。但翻车更多的还是发生在机动过程中，顶着一个“大脑袋”炮塔，重心过高，驾驶员稍微不注意路况就会发生翻车。

（乌 沃）



DC-3运输机。

苏联何以击落瑞典侦察机？

■ 鲁 西

1952年6月13日，一条关于苏联米格-15歼击机在波罗的海上空击落瑞典“道格拉斯”DC-3运输机的新闻曾让全世界目瞪口呆，机上8名机组成员，无一生还。

这架运输机其实是瑞典军方的侦察机，但在飞机被击落当天，瑞典政府却宣布这架飞机是在哥得兰岛地区上空进行通信系统演练飞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一事件引发了苏联同瑞典的外交纠纷。对于这架被击落的DC-3运输机的身份、执行的任务、机组成员的下落等情况，各方也是莫衷一是。瑞典一直不承认这架飞机是在对苏联进行侦察，而苏联人则一直坚称是因为瑞典飞机侵犯了苏联领空，才被击落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架DC-3运输机并没有被击落，而是被击落到苏联，机组人员被送进了西伯利亚的集中营，所以他们的亲属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

而这些机组人员的家人也确实不知道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罗格·艾尔梅伯格是这架瑞典侦察机驾驶员的儿子，父亲罹难时他只有3岁，他说：“只是因为我父亲为自己买了寿险，我母亲才猜想他领受了一项危险任务。”

罗格是一支私人沉船考察队的倡议者，正是他们在哥得兰岛东边55

公里处的水下发现了DC-3飞机的残骸。瑞典政府在坠机机组人员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决定将飞机打捞出。因为受技术原因和恶劣天气因素影响，打捞工作一波三折，先后推迟了数次，好在受损严重的飞机最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送到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穆斯克海姆基地。

这架飞机当时全身覆盖着厚厚一层水藻，尾部被打成了碎片，但仍能清楚地看见瑞典的“三皇冠”标志。人们只找到了机组8名成员中4人的遗体，另外4人却渺无踪迹。此时，瑞典政府才承认，这架运输机实际上是一架军用侦察机，装备了当时最新式的美国制侦察设备，执行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沿海地区苏联防空系统的情报侦察任务。这条“波罗的海走廊”是冷战中中美核轰炸机计划突袭苏联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重要空中通道，北约迫切需要掌握这些地区的防空情报。瑞典因此与北约达成了秘密协议，以侦察飞行获取的情报换取北约的飞机和电子设备，但没想到侦察机却被苏联打了下来。

侦察机的行动是密级极高的保密信息，难为外界所知，况且这架侦察机还以“运输机”的身份作为掩护，那么苏联是如何确切获知这架侦察机的真实身份以及活动情况的呢？这还要归功于他们在瑞典空军

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那就是瑞典空军上校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

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多才多艺，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的远亲，在瑞典军界人脉广泛，颇受重用，经手掌握瑞典国防部大量机密，因为胆小怕事同时又极其虚荣，1948年在莫斯科担任瑞典驻苏空军武官时被苏军总参情报部“格鲁乌”招募，1952年赴美担任空军武官，1957年任满回国，在1961年退役之前一直担任瑞典武装力量总司令部作战部空军部门的负责人，退役后担任外交部长军事顾问，前后为“格鲁乌”效劳将近15年，为苏联人提供了瑞典、北约及其成员国大量核心内幕情报资料，1963年被捕后酿成“瑞典有史以来最大的间谍丑闻”。

正是斯蒂格·温纳斯特洛姆向“格鲁乌”报告了瑞典军用侦察机的飞行时间和路线，莫斯科才获得了机会击落这架瑞典侦察机。

